

2013 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第 15 届年会综述

胡亦琴

2013 年 10 月 19—20 日,由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主办、浙江财经大学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承办的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第 15 届年会暨“包容性发展:公平与创新”全国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办。来自南开大学、辽宁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高校以及人民日报理论部、《经济学动态》杂志社、《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经济学家》杂志社、《贵州社会科学》杂志社、《浙江学刊》杂志社、《财经论丛》杂志社、中国能源报社等单位的 120 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专家学者们围绕上述领域的重大理论、政策和现实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下面对入选论文和会议发言的学术观点进行综述。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包容性发展

包容性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切实需要重视的现实问题。

南开大学张仁德教授报告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认识问题,认为包容性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包括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目标,而市场改革和建设是手段,市场并不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不能全盘西化,市场化改革不能走偏,不能完全走资本主义道路。

浙江财经大学周冰教授从马克思的矛盾论分析了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认为中国改革的主线可以概括为:从权力走向权利,一方面是约束和规范国家权力,另一方面是建立和完善私人产权制度,规范微观主体的权利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回顾了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差别,把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国家组织能力的缺失,政权的丧失和缺乏对民族产业保护,地方权力过大,中央控制力弱。进而提出了当前改革开放阶段的潜在危机主要表现

为外汇占款导致货币自主权丧失,认为需要警惕洋进民退,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

湖南大学陈乐一教授分析了我国历次党代会与经济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建国以后、党的“十八大”前召开的 10 次党代会中,在党代会召开的当年经济运行上升到经济周期中波峰有 4 次,在党代会召开随后的年份出现经济的扩张与繁荣有 5 次,可见,我国党代会的召开一般都会带来经济的扩张与繁荣。

二、包容性发展在我国的实践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同我国政府实践“包容性增长”的决心和信心。包容性增长的发展理念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着我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

1. 以包容性发展理论指导经济发展。天津师范大学李家祥教授基于公平竞争、改善民生、完善医改等包容性发展的观点,介绍了天津市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的实践特点与思路,认为当前要处理好“胆子与步子”的关系,注意在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寻求平衡点和改革新突破,解决现阶段面临的经济稳定增长问题。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王仕军教授以“包容性增长”理论为指导,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研究了南京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问题。“包容性增长”强化了南京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人本”取向,指明了南京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建设重点,同时也提供了南京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方法论指导。

广东财经大学林洪教授认为,包容性发展与中国经济社会中长期规划在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有高度的一致性。分析指出包容性发展和中长期规划在目标、实现途径和评价体系这三个维度都存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为以实现包容性发展为目的的中长期规划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可行性。

2. 我国包容性发展的实证研究。贵州大学李晓红教授在包容性发展视角下研究了我国西部农村人口自我发展能力评价问题,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地

区农村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总体水平较低,且省际差距大、区域内部均衡性差;人均耕地、农业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受教育程度是影响生产能力的重要因素;家庭经营收入和经营费用是影响交换能力大小的主要因素。

华中科技大学王上铭博士对我国教育公平、医疗公平、收入分配公平、就业公平、交通基础设施公平、社会保障公平进行了实际测度,建议国家采取措施,提高社会公平程度,尤其是收入分配、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公平程度。

三、二元经济结构与经济转型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过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经济转型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1. 关于二元经济结构。厦门大学付才辉博士在一个异质性人力资本模型中分析了城市现代部门内部的结构变迁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结构升级通过人力资本增长放大了城市高级劳动力的工资增长率,但却削弱了初级劳动力对高级劳动力工资增长的驱动作用。在经验模拟中,中国的二元经济转型形势严峻,增长有下行的趋势,而不平等有上行的趋势。

南开大学乔晓楠副教授利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探讨了在存在剩余劳动力和不存在剩余劳动力两种情况下,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该模型证明了在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人口红利的消失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比不存在剩余劳动力时人口红利的消失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要小。

南开大学姜磊副教授和任皓建立了一个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两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探究了劳动收入占比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劳动力转移初始阶段,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有利于经济增长;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西南财经大学程莉博士研究表明:重庆市二元经济结构呈现出倒N型变动轨迹,城乡收入差距呈倒U型变动轨迹,城乡消费差距则呈M型变动轨迹,总体而言,城乡差距在开始缩小。城乡统筹政策的制定,需要综合考虑内部地区经济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相互交织的复杂模式,制定相应政策着力解

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2. 关于经济结构转型。清华大学的孟捷教授从波兰尼和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商品化概念差异的视角分析了中国过去30年的劳动力商品化和雇佣关系的变化,认为我国目前是劳动力高度商品化但无产阶级化比较低的状态,而过度商品化必然会导致社会反向运动,其中西部大开发、民工荒现象就是体现了这一运动方向,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也顺应了这种运动方向。

浙江省政府研究室沈建明研究员做了关于浙江经济发展问题的专题报告,详细讨论了浙江省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收入增长、生态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具体政策规划,报告强调了GDP增长、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城市化、深化教育改革等对于收入增长的影响,以及法制建设和政府行政权力改革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

四、人口、资源与环境

1. 人口与包容性增长。福建师范大学郭铁民教授认为,目前我国的就业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态势出现下行趋势,劳动力市场多重体制分割,存在制度不公平现象;劳动力短缺结构性特征明显;劳动者就业能力不足;劳动保障缺失时有发生。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理论,要遵循人力资源配置规律,政府、企业、劳动者个人要形成合力。

青岛大学逯进教授研究发现,我国各区域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都存在稳定的正向协调演进机制,但总体看二者的耦合度并不高,且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从空间上表现出由东至西依次递减态势,同时,还表现出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适宜性特征。未来可能会由简单劳动力迁移带动的经济增长过渡到由高素质人力资本迁移带动的崭新阶段。

2. 资源、环境与包容性增长。海南大学王毅武教授以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为例阐述了生态文明与绿色崛起之间的关系。主要观点包括:生态文明与绿色崛起是可持续发展与实现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也是海南富民强岛的必然路径与实现形式。生态文明是绿色崛起的宗旨与归宿,绿色崛起是生态文明的路径与规范。

西南财经大学郑欢博士研究发现: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均对我国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影响,能源消费结构效应对碳强度降低的影响力不大,经济发展水平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在我国成立。

五、工业化、城镇化及城乡收入差距

1. 包容性发展与工业化。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的研究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对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严峻挑战主要表现在:现有的比较成本优势加速削弱,劳动力就业的压力将不断增大,产业升级遭遇与发达国家之间直接的激烈竞争;同时,它也为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创造了新机遇: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为我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赶超发达国家和包容性发展提供了重大“机会窗口”,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我国廉价体力劳动者提供了转瞬即逝的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最大的就业机会。

西南财经大学程民选教授在分析公益型国有企业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指出:公益型国有企业的根本特质应在于公共产品的提供,虽然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与私人部门一样可能存在负外部性,但是较之私人企业,政府治理国有企业负外部性的成本相对要低。

哈尔滨商业大学曲振涛教授等从金融与研发投入视角分析了企业成长规律,研究表明:外部融资约束对企业生产效率有显著负面影响,企业技术研发对生产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外部融资约束通过技术研发投入途径对企业生产效率产生抑制效应。

2. 包容性发展与城镇化。天津师范大学丁为民教授认为,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趋势主要是资本积累和资本空间运动的结果。资本运动中的矛盾在其空间运动和城镇化中也表现出来,用时间消灭空间、空间扩张和空间修复,由此引发的城镇变迁和兴衰,是资本暂时解决矛盾的手段和结果。政府在资本空间运动和城镇化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些认识对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有重要启示。

天津商业大学王树春教授通过对城镇化进程的再定义,指出居民幸福感提升应是判断城镇化建设成败的终极标准。要在城镇化进程中提升居民幸福感,就必须解决好城乡居民生存与发展机会的分配问题。产业竞争力问题、“三农”问题和公共服务质量问题是城乡居民生产与发展机会分配过程中的三个核心问题。

3. 包容性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结合现实国情,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措施,为当时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出现了效率与公平失衡的现象。包容性发展在本质上要求效率与公平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盐城师范学院贾后明教授指出,分配问题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分配和谐存在许多困难。市场分配和谐的基础是树立利益分享的理念,坚持共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上建立适应和谐社会要求的分配模式。

武汉大学祁毓博士的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是影响环境质量和国民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收入不平等对国民健康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环境质量进行传导的。因此,无论是制定收入政策、环境政策还是健康政策,不仅需要考虑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与影响机理,而且还要重视制度环境的培育和塑造。

六、金融发展、全球化与经济发展

谷远近博士认为,发展包容性金融也是包容性发展的一部分。目前,我国金融业的双向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一方面剩余民间资本无处去,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却贷不到款。对银行业来说包容性发展就是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机制,放低民间资本的进入门槛。改革的过程会暂时让一部分人利益受损,但长期却能让更多的人受益。

山东大学刘国亮教授认为,国际间垂直专业化分工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孤立地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现象的方法越来越受到限制,尤其在增长领域,全球价值链的构建和发展使得各国间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彼此。

浙江财经大学项后军教授研究发现:汇改后的汇率变化对我国大部分行业的出口商品价格具有长期影响,短期影响并不明显,国内出口企业只能在长期中逐步消化汇改后汇率的升值性变化。汇改后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确实给实体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的出口行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经济与国际贸易学院)

(责任编辑:钟培华)